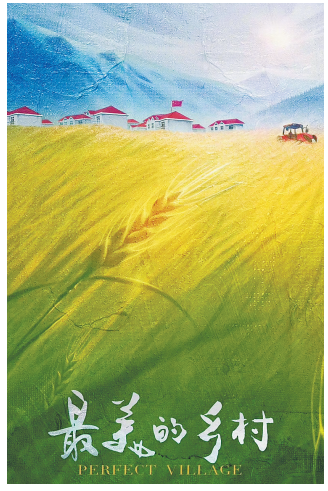


# 高扬脱贫攻坚胜利旗帜的时代画卷

## ——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



□王离湘

电视剧《最美的乡村》近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圆满播出,在现实主义题材主旋律作品中脱颖而出,收视率始终稳居同时段电视剧排行榜首。腾讯、搜狐、爱奇艺等网络平台播放量达几千万。专家称赞这部作品生动展示了我国脱贫攻坚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是一部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的精品佳作。

艺术是时代的回声,时代的进步靠思想的引领。《最美的乡村》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大局”战略思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紧扣脱贫攻坚主题,弘扬时代主旋律。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重点剧目,《美丽的乡村》的热播,给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该剧凭借对主题的深入开拓,通过一个个真切感人、引人入胜的故事,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以创作手法的突破和创新,立体、深入、生动地再现了我党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业,宣示了致富路上一个也

不能少和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根植燕赵沃土,讲述河北故事。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以西柏坡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和以塞罕坝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河北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最美的乡村》诞生在这片热土上,有其必然性。该剧以承德乡村为代表的燕赵大地脱贫攻坚战线上党员干部的先进典型为创作原型,完美诠释了举国上下实施的脱贫攻坚战略。“脱贫攻坚八措并举组合拳”和“脱贫攻坚党旗红”是作为贫困地区的承德市探索出的脱贫工作模式和做法,该剧将这些行之有效的模式做法艺术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对脱贫攻坚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必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最美的乡村》真实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场景、农民的生活方式。剧中,扶贫干部对贫困户标准的精准把握,对扶贫医疗保障等政策的准确解读和有效落实,没有一点儿说教、做作的感觉,让人听得进、记得住、弄得清。

《最美的乡村》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党中央战略部署,以深情笔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在意识形态宣传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生动诠释中央精神内涵。《最美的乡村》以三段式的结构,突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主题主线,从扶到扶志,再到全面振兴,全景式展现了以唐天石、辛兰、石全有三位主人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贫困乡村,精准扶贫,为乡村脱贫攻坚不懈努力奋斗的故事。作品以鲜活的情节设置、扣人心弦的矛盾演绎,详尽解读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堪称一部脱贫攻坚的科普教材;以从基层典型为创作原型,完美诠释了举国上下实施的脱贫攻坚战略。《最美的乡村》创作历时三年,剧本三易其稿,实地拍摄四次,编剧、导演和主演都是先深入乡村体验生活的村民、积极进取的精神、农业产业的兴旺等一幅幅美丽的图景,构成了《最美的乡村》的独特气质,形成了以生活写实和艺术化写意的完美转换,在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带

来不少回味和思索。打造精彩故事亮点。《最美的乡村》编导深入故乡河北承德采风,饱含浓厚的乡情、乡韵和乡愁,深情讲述脱贫攻坚的精彩故事。评论家李准认为,剧情故事抓住了扶贫工作中具有个性化的难点和特点,能够抓住观众的兴趣,所有难点解决之后,就变成了亮点。编导用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养蜂刺绣、生态旅游等鲜活故事,进一步引领和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决战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这些源于生活的人物和故事在电视荧屏上显得格外真切质朴、生动感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剧对党脱贫攻坚工作程序和要求掌握得细致全面、把握得精准到位,诸多故事化的解读和诠释更显生动灵活、不着痕迹。

直面现实问题。在创作中,如何表现农村存在的矛盾与困难,这需要主创团队直面农村问题的现实主义勇气。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面临重重矛盾,有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思想观念因素等。该剧将复杂的内因外因都力求展现出来,比如,前两个单元表现的上河峪村、那家沟村,无论是历史的土地贫瘠还是搬迁后的问题,都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抒要义,未作回避。再比如,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思想观念的矛盾、宗族势力的矛盾等,环环相扣、渐次演进。剖析这些矛盾根植于现实乡村生活土壤,探究了贫困的根源,也成为人物的行为动机。编导满怀高度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自觉,把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政策春风化雨般地融汇于当下的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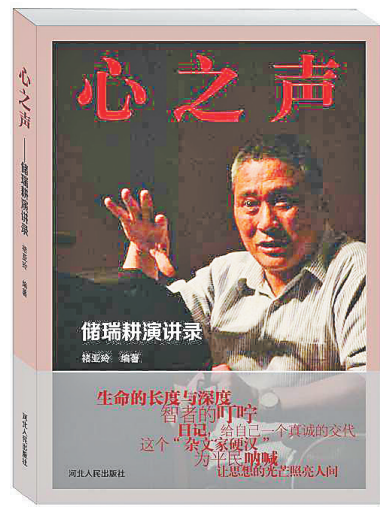
盾铺陈与情感表达中,用深入人心的扶贫故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最美乡村的美好前景注入精神动力。

塑造鲜活人物形象。该剧注重在时代精神的塑造中让鲜活的人物呼之欲出。塑造出既符合客观事实,又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人物形象是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一环,也决定了这部剧的艺术水准与生命力。这部剧在人物塑造上有两大亮点:首先,对主人公的刻画彰显出美感和质感。三个单元主人公形象各异但精神特质相同,退伍转业干部唐天石尽职尽责,做事讲究技巧和智慧,身上有一股“巧劲儿”;任村第一书记的辛兰,在工作中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身上有一股“真劲儿”;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石全有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他的很多想法在家乡这片热土得以实现,身上有一股“韧劲儿”。无论用哪种劲儿,他们都全心全意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人们心中的感动和敬意油然而生。其次,该剧也塑造了多位形象饱满的人物形象,如科技扶贫的周教授、上河峪老兵以及大芹子、依依等一批新时代农民群像。这是现实主义的表演手法,其核心在于剧中人设如何突破各种压力和阻碍,最终赢得观众喜爱,产生强烈共鸣并达到精神引领的艺术效果。

电视剧《最美的乡村》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在“最美”的赞叹中让主旋律作品再攀“高峰”,也为影视创作生产的“河北现象”增添了更新更有力的注脚,以河北人特有的风采奏响了时代强音。

# 人生“正气歌”

——读《心之声——储瑞耕演讲录》



□刘江滨

“你现在还好吗?”  
“不好!”  
“住哪家医院?我去看看你。”  
“不可以!”  
这是储瑞耕电话里对我问候的答复,斩钉截铁,干净利落,没有矫饰客套,毫不拖泥带水,典型的储氏风格。我刚刚收到一本由褚亚玲编著的新书《心之声——储瑞耕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便在朋友圈看到了储瑞耕病床上的照片,心生惻隐,就打了这个电话。储瑞耕一生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都顽强地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生命力之强劲令人瞩目。长期以来,伴随着死亡的威胁和病痛的折磨,储瑞耕笔耕不辍,奋斗不止,“让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荣誉已臻业界顶级,可以说创造了生命的辉煌。这是一部励志书,催人奋进;这是一部智慧书,启人心智;这是一部生命书,涤人灵魂。

做人有品格,立世有理论,工作有方法,著文有技巧。这是我读了《心之声》后,给储瑞耕总结出的“四有”。

做人有品格。古人所谓“三不朽”,立德居首。储瑞耕一直把践行“三不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将其通俗为“三做”:做人、做事、做文章,其中尤重“立德”。他说:“‘立德’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根本。”“立德”是一个修炼过程,是伴随人的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要一环扣一环,坚持不懈地修炼、精进、奋斗、成熟、完善。”而且他还提出一个“一重三有”论,即重人格,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储瑞耕一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创办主持《杂文报》与写杂文,二是主笔《河北日报》言论专栏“杨柳青”。两者一脉相承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担当,为民请命、激浊扬清的铮铮铁骨,沛然于胸、形之于外的浩然正气。无论日常还是行文,熟悉储瑞耕的人都知道他常用的一句话是“怎么可以?”或“不可以!”对是与非判断分明,没有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

立世有理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奉行“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的人生态度,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走到哪儿算哪儿。可以想见,这样的人生态度只能流于平庸。储瑞耕的成功之处,恰恰是他除了奉行圣贤之道,如“三不朽”等,还不断总结提出自己的做人立世的理论,作为他扎实的支撑。如“四个以寄”:既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事业,“那么就必须(不可以不)兴趣以寄,精力以寄,心血以寄,性命以寄。”再如“红烧鱼”理论:“我既在某个单位工作,那么这个单位‘有我’与‘没我’就必须不一样,不可以去当一盘红烧鱼上的那片西红柿或香菜——没我不显少,有我不显多。”这些观点,不仅鞭策了自己,也鼓励引导了他人。

工作有方法。做文字工作,光凭勤奋加汗水不行,更需要聪明加智慧。储瑞耕提出了“舆论监督三法”:点名道姓法、敲山震虎法和反弹琵琶法。一般而言,报纸评论多是“据报载”,借题发挥或就事起议,提出观点,引导舆论。而储瑞耕的“杨柳青”评论,却走出了另外一个路子,就是通过直接采访获取资源。这样,不仅文章接地气、新鲜如同带露珠的嫩叶,而且由于直接亲历,态度更明确,观点更鲜明,论据更充分,胆子更豪壮,文章的说理、感染力无疑就更强。这也是“杨柳青”影响巨大、成为中国新闻名专栏的原因之一。有一年,我曾陪储瑞耕去某县采访,他事先跟谁都没打招呼,带着我径直一头扑进污染企业。

著文有技巧。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时评家、杂文家,储瑞耕终究是通过立言来实现他的立功、立德的,即以言论立身,以文章名世,以著述度人。长期的写作,储瑞耕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如杂文“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死活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陶冶论”: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另外,还有“花环论”“味精论”“四要素论”“包饺子论”……当然,他也有观点冗杂之繁,不过,必须承认,这些观点是他智慧的结晶,自觉的审美追求,大多行之有效,也是其文生动活泼、不拘一格、富于浩然、宛如文苑一棵常青树的原因所在。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储瑞耕写作最大的窍门,是持之以恒记日记,这是他在书中心心念念反复向人推广的一条经验。日记,是一个人的心灵底稿,也是绝好的练笔方式。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储瑞耕我近20岁,按说不是一代人,彼此之间却时常“嘻皮笑脸”“鬼头鬼脑”,没一点正经。我不喊他“储老师”,而是“储大师”,尊敬中含有调侃的味道。在我心里,储瑞耕是一个纯粹的师,透明的人,坦诚率真,爱憎分明,正气浩然,笔力千钧。储瑞耕在《序》中坦称这本书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郑重的告别礼物”,不免让人闻之怆然。其实,储瑞耕早已看淡了生死,2012年他就经过公证成为遗体捐献的志愿者。这份无畏,这份豁达,这份透彻,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者所拥有,非常人可及。

# 改革开放时代的多重声音

## ——评刘建东中篇小说《甘草之味》

□疏延祥

刘建东是一位不断对小说题材以及表达形式进行多样性探索的先锋作家。他的新作中篇小说《甘草之味》(《花城》2020年第3期)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书写了农民企业家秦大贵和通过自修成为医生的知识分子董耀先的命运沉浮。

刘建东早期的作品讲述的故事多涉及亲情、爱情、友情。2002年他在《收获》刊发长篇小说《全家福》,采用现实主义与先锋相结合的形式,以城市平民家庭为对象,写出了活法不一样的兄弟姐妹、性格不同的父母。十年磨一剑,刘建东于2012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一座

塔》将其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该小说一方面保留了先锋式探索精神,另一方面采用了“两面性”书写、“三重叙述”的方法及象征手段,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代风云跌宕的历史,表达出其独特的真实观、历史观以及诗学观。近年来,刘建东创作的《阅读与欣赏》等“工厂系列”小说更是兼具现实主义质地和现代主义气息。

《甘草之味》主要人物秦大贵是“我”小姨夫,在“我”父亲董耀先的介绍下,他到城里当了一名锅炉工,后来筹资回乡下开了砖窑厂。正当其事业欣欣向荣、人生得意之时,一场砖窑事故让他倾家荡产。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装修队伍,一步步成为亿万富翁。董耀

先在小说里从头至尾都是正派人物,他的行为可圈可点。他通过自己努力,自学中医,获得执照,摆脱了以工代干的尴尬身份成为国家干部。在能成为医院院长的巨大诱惑面前,董耀先不动声色地放弃了,辞职开了一家小诊所,最终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小说细节处理得很好,如秦大贵衣服的变化。办砖窑厂初步成功后,秦大贵也跟着时代潮流,穿起了西服,那是一件灰色的西服,不平整,像是揉搓过的。这样的西装非常适合窑厂老板的身份。秦大贵有了自己的装修公司后,西装讲究了许多,板正,纯毛料,还打上了红色的领带,这种装

束非常切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步成功者的形象。

秦大贵和董耀先这两个人物的对照描写,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秦大贵作为农民企业家经常读报,了解国家政策方针,调整人生规划。他与共和国同龄,从乡村到城市,再回乡办厂,又进入地产甚至医疗行业,他的履历不妨看成一部改革开放的正剧。小说结束时,董耀先为秦大贵治疗癌症,秦大贵放下亿万家产,和前妻周游各地,在祖国山水和异国风光中释放自己。文艺理论家弗里德连杰尔在分析《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说:“小说的所有人物之间都进行着隐蔽的对话(这一对话并不是一直都暴露出

来的,也不是一直都具有唇枪舌剑的性质)……尽管作者公开带着自己的‘声音’和‘独白性’,但主人公的争论并没有解决,也没有做出最后结论。”

刘建东的《甘草之味》不仅有董耀先和秦大贵的声音,还有秦大贵和前妻的声音,“父亲”和“母亲”的声音,“父亲”和“我”的声音,他们之间这种“独白性”和“复调性”既互不互相否定,也不互相排斥。刘建东将他们处理成复调声部,这种对话关系在小说结束时仍然存在。“父亲”董耀先和秦大贵显然也不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他们也存在着互相学习、互相成全的关系,小说写到最后他们的对话仍在继续,并将永远继续下去。

# 守望故园乡土

## ——评潘红亮《青青皂荚树》

□孟庆玲

《青青皂荚树》(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是冰心奖获得者、儿童文学作家潘红亮(笔名雁阵)的又一力作。作为“童年中国书系”中的一册,该书由五篇散文组成,详尽生动地展现了作者的童年经验和故乡情怀。

童年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童年是一坛被岁月封藏的酒。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充分讨论了童年的“根性”本质,强调童年并不是在完成它的周期后即在我们的身心中去死并干枯的东西,它深藏在我们心中,是生命的原型,是活力的宝藏,并向我们传达出一种植物性力量——“在缓慢地书写中,童年的回忆一一舒展开来,静静地呼吸”。

阅读潘红亮的作品,静谧中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这种静谧源于他对童年时代天地万物最为本初、纯净的感知和思考。山野自然、农事劳作、童年游戏……那些平凡而久远的事情,隔着时光的滤镜,在作者笔下迤邐而来。这些乡村和童年经验不仅仅是一段生命历程,经过时光的发

酵,它又像一块琥珀,映照着喧嚣的城市和沉重的成年。

山野风物不仅是潘红亮童年生活的背景,更是一种可以亲切交流的对象。《青青皂荚树》中像家里大黄狗一样的云彩、前面挂着黑色挡尘布如戴着黑口罩的汽车;《田野与月光》中礼花一样照亮田野的白月光、像甲壳虫一样脑袋尖尖的葵花籽;《草木生灵记》中灵气十足的花草虫鸟……在孩子眼里,这些物象是有灵魂的,和人类一样有体温,有思想,有感情,他们为童年打开一道道通往大自然的门。

农事劳作则是辛苦的,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一粒种子就是一部分农事。作者和家人一道奔波于田野,种向日葵、割麦、挖红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乐此不疲。在大人看来辛苦的农事,对作者来说却是饶有兴致的乐事,是人生的宝藏。这些宝藏是诗意的乡村记忆和难以忘却的童年经验。通过对农事劳作的书写,作者将对故乡的守望延伸为一种文化层面的精神归属。

在亲密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协作中,童年的乡士人伦承接了传统的文化底蕴:沧桑睿智的奶奶、为

谋生往来城乡的父亲、辛勤劳作的母亲、调皮的玩伴……“我”和他们有矛盾,但更多的是血肉至亲的关爱。这种情感推而广之,是邻里乡亲朴素敦厚的情谊,是素不相识的赶车人的热心,是陌生爷爷指路的耐心。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父亲和奶奶形象的塑造。奔波于城乡的父亲,在乡村生活中是个缺席者,但却丝毫不损其高大形象:《青青皂荚树》中,是父亲将离家出逃的“我”带回安稳的日常;《“红旗”自行车》中,是父亲在风雨中扛起自行车,助“我”走出困境。父亲是传统秩序的继承者和维护者,有了父亲,“我”的童年才是完整的。奶奶的形象则是亲和、智慧的。她勤劳,一生都在劳作;她睿智,家常话里蕴涵着朴素人生哲学——天上的老鹰,飞得多高、多远,最后还是得落下来。她在“我”生病时悉心照顾,她随时随地能哼出无数迷人的儿歌。于“我”而言,奶奶正是传统文化的启蒙者。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书中描绘了很多儿时的游戏,摸树猴、做泥哨,围滩子捉鱼、推桶箍……《金色的泥哨》仿佛童年游戏“博物馆”,以整篇篇幅“陈列”了那个时代的游戏:整泥、弹弓、跳皮筋、

打碟溜……作者曾做过这样的梦:“我推着一个闪亮的桶箍从村庄出发,不知疲倦地奔跑……”这是告别童年和故乡、长大成人的预言。多年后,作者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日夜推着“火车闪亮的桶箍”在轨道上奔跑。从童年出发,从故乡出发,盖上童年和故乡的印戳,即便沧桑历尽,万水千山走遍,人生也便有了履历和回望的出处。

成长是五味杂陈的,不仅有快乐,更带着淡淡的忧郁。这忧郁来自存在感的缺失:农耕时代散养式的少年向往自由更向往父亲。《青青皂荚树》中,因为觉得多余,骑在高大皂荚树上的青青,像一只孤单的大鸟,俯瞰着村庄。他决定以走出去城里寻找父亲的壮举来获取存在感。出走是青青生命中里程碑式的事件,青青最终找到了父亲,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忧郁还体现在对疾病和死亡思考:七八岁时“我”得了一场大病,出现各种幻觉,虽然最终痊愈,但疾病带来的恐惧使“我”感受到人生的无常。玩伴小黑子得脑膜炎死了,对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一个人的突然消失除了其神秘、令人



恐惧的一面,更让人无助和悲伤。这无助和悲伤促使“我”和伙伴们在小黑子家附近的空地上,在月光里,在大槐树的碎影下,无师自通,以类似巫术的形式唱起招魂的儿歌:“雉鸡翎,砍大刀。怙家人,给俺挑……”生命覆水难收,友情是蒸腾的云,在童年的天空,云的记忆缭绕永在。

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我们都无法重回童年,那就亲近一下童年熟悉的花草,倾听记忆中的清脆鸟鸣,哼唱一段儿时的歌谣,或者,轻轻打开《青青皂荚树》,来完成一次对故乡乡土的拳拳守望……